

# 研究討論

## 「歷史人類學工作坊」會議摘錄： 《羌在漢藏之間》發表與評論會

編者：顧坤惠\*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 緣 起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與中研院民族所「歷史人類學研究群」（原名「歷史、記憶與文化建構」研究群），於2004年2月25日假清華大學人社院舉辦一場「歷史人類學工作坊」，從歷史學、人類學以及這兩者間的交流的發展史來看，近年來在台灣、香港、中國這三個地方初步成果的一個回顧。工作坊分成四個場次，前三場分別回顧與討論了2003年台灣與香港／中國出版的幾本重要歷史人類學著作——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漢藏之間》一書（聯經出版）、新發行的《歷史人類學刊》（中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編），以及《台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專題「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黃應貴先生主編）。第四場綜合討論由不同學者透過區域研究的觀點，回顧亞太地區不同子區域研究中，歷史人類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的交會主要議題為何，未來可能的發展為何？工作坊的目的是檢視現有的成果，然後在這之上，思索下一步要怎麼走。其它場次資料將分別發表於漢學研究通訊、南島研究學報、亞太研究論壇（2004，第26期），有興趣者或可參見研究群網址 [www.sinica.edu.tw/~histanth](http://www.sinica.edu.tw/~histanth)。（註1）

---

\* 騰稿：郭玉敏，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1. 編者按：王明珂先生的報告與問題回覆均經過他本人重新修改過。

## 歷史人類學工作坊開幕致詞：

葉春榮（民族所副研究員）：

今天很高興來貴校參加歷史人類學工作坊，這次是由清華人類學研究所跟民族所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建構研究群」共同舉辦，我謹代表民族所歷史記憶跟文化建構研究群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工作坊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夠集思廣益，針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能夠得到大家珍貴的意見。民族所歷史記憶跟文化建構研究群雖然已經掛牌很久，可是實際上於去年（2003）七月才開始運作，除了我以外，顧坤惠、郭佩宜，還有楊聰榮，正式參加的只有我們四位。我當然很希望有興趣的人一起來，我們設有一個網站（<http://www.sinica.edu.tw/~histanth/>），希望看了網站有興趣的人，跟我們連絡，留下 e-mail，我們希望能夠集合到更多的人，大家在這個主題上能夠共同努力，這是我們辦這個會的主要目的之一。今天我大概講到這裡，我要謝謝主辦，尤其是清華這邊的顧坤惠、民族所的郭佩宜兩位，她們籌劃了很久；還有清華這邊的工作人員，謝謝大家，謝謝。

陳祥水（清大人類所所長）：

今天謝謝大家來參加，不管是從台北來的、或是從其他地方，都歡迎你們來參加。顧老師還有郭老師，在這方面盡了非常大的努力，應該謝謝她們。還有工作同仁、我們的學生們，每次都很踴躍參加，幫很大的忙，也謝謝他們。我想，李亦園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裡面提到人類學研究方法，有一個貫時性的研究，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研究，只是我們常常有一些選擇性的失憶，好像把這個歷史的重要性忽略掉了。但是也不盡然都沒有歷史，只是這個是很淺的歷史，沒有辦法跟歷史學者相呼應，或者沒有辦法從歷史文獻資料裡面找到一些很好的檔案，也不知道怎麼樣運用，這大概是我們的一個缺點。我想藉今天這個機會，尤其很高興是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先生，他前後寫了兩本書，雖然是歷史學者，可是跟我們都有很大關連。尤其最近這一本新書《羌在漢藏之間》，我想對於人類學家可能有很好的提示。今天很高興他在這裡，等一下還會當我們討論的回應人。我想，怎麼樣像他所說的，可以在歷史民族誌還有現實關懷裡面，把這兩個學科

結合在一起，讓我們比較知道如何好好掌握一些歷史文獻資料，讓我們可以在歷史與文獻、歷史與文化，或歷史與民族誌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希望今天這個小而美的會議可以幫助大家在知識領域上有所提升，謝謝！

主持人引言：林淑蓉老師（清大人類所副教授）

我們現在進行今天第一場重量級的討論。重量級的原因是，王明珂先生是族群研究、歷史記憶這方面的專家，他寫了兩本書，《羌在漢藏之間》是他的第二本。第一本出來的時候，相信在座很多清大的同學都知道；很多同學對於有關族群關係、族群認同的討論，常常會引用王明珂先生的觀點，所以這也是他的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王明珂先生主要在中研院的歷史與語言研究所，他目前除了是研究員之外，也擔任副所長的工作。然後，人類學部分的與談人是何翠萍教授，她除了在中研院民族所工作之外，也是清大人類所的兼任老師，上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課，所以同學對她應該不陌生。另外一位歷史學的專家是沈松橋先生，沈老師是中研院近史所的副研究員，寫了有關國族想像、國族認同方面的著作，今天請到兩位來對談是最適合不過了。我們請王明珂教授先作十分鐘摘要他自己的書。

王明珂（史語所研究員）

這本書《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是我近十年來在羌族研究上的一個專著。我很高興有此機會，向各位朋友介紹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在書名上用了「歷史人類學」幾個字，所以有必要對人類學者交心表態一番。以下，我先簡單說明這個研究所根據的田野與文獻。其次說明，我自己所認為的，這本書的內容重點。最後，我提出一些在這本書出版後，與此有關的，我繼續思考的一些問題。

## 問題、田野與文獻

在進入田野前，我主要的問題非常簡單：如果認為「羌族」只是一個華夏所建構的族群邊緣（異己）概念，那麼為何有今日的「羌族」？今日「羌族」如何得到這樣的少數民族認同？在1994年第一次進入田野不久，我就得知他們在1950、60年代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羌族」；於是問題便是，他們如何得到一些「歷史」

以成爲「羌族」，以及這些「歷史」如何被爭論或被強化？在成爲羌族前，本地人群的族群認同體系如何？什麼樣的「過去」支持這樣的認同？因此，除了注意一般的民族誌背景如生產方式、資源分配與分享體系、兩性關係、宗教信仰、親屬體系等等之外，我最主要的關注是田野中所見的「歷史」，與影響「歷史」建構與流通的社會「權力關係」(politics)。此外，我廣泛閱讀本地明清以來的各種文獻，嘗試了解本地的歷史與歷史記憶背景。無論是田野所見各種表徵，或口述與文獻資料，我都將之視爲藉由各種媒介所展現的社會記憶；透過表徵與文本分析，我嘗試了解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本相與情境。

## 主要內容

本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社會篇。我先介紹本地居於漢藏之間的環境，夾雜漢、藏因素的各種文化表徵，以及溝中各村寨間的資源分享與競爭。其次我說明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以血緣記憶凝聚的各層次「族群」認同與區分；以及在如此認同結構下，村寨居民如何藉由「毒藥貓傳說」，透過女人的污染、毒與蠻子隱喻，來強化一層層的家族與村寨認同。第二部分歷史篇，我說明這樣一個認同體系，以及夾雜在漢藏間的文化現象是怎麼形成的。我先解構典範羌族史，說明此羌族史如何在近代被建構起來。然後從華夏邊緣的變遷史，來解釋當前羌族的形成。

第七章，「本土根基歷史：弟兄祖先故事」應是全書的關鍵。在這一章中，我說明爲何「弟兄祖先故事」在此是一種以血緣凝聚並區分人群的「歷史」。分析此種歷史敘事中的空間、血緣與時間，弟兄隱喻，以及它們與溝中村寨生活中的資源分配分享等情境之間的關係。這一章中有兩張重要的圖，圖十四與圖十五，一爲較漢化的北川內外溝的弟兄故事圖，一爲漢化程度低的松潘埃期溝弟兄故事圖。這兩張圖，及相關文本，也顯示「漢化」造成敘事中的血緣與空間逐漸分離。由於在本地多有此種結構類似的弟兄祖先故事，因此我認爲這是本地社會文化中的一種歷史心性之產物。也在這一章中，我以松潘埃期溝弟兄故事來與《後漢書西羌傳》中的敘事作比較，我以後者代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產物，以此突顯這兩種歷史心性的差別。由第七章，得以了解我在第一章中所介紹的本地自然環境因素；第二章中所提及的，溝內外資源競爭與劃分的情形；以及第三章所描述

的「族群認同與區分」，也就是在上述自然環境與資源情境下，人們如何組成各種血緣或擬血緣群體，以行資源競爭、分配、共享。特別是在第三章，我將家庭、家族等群體都納入廣意的「族群」中來探討。便是由於，在此無論是家庭、家族、溝中村寨人群等等，都常以「弟兄祖先故事」作為共同的歷史記憶。這或與傳統上，研究「族群」的學者不討論「親屬群體」有所不同。但在本書中，這是一個重要環節。

在第四章「結構下的情感與行為」中，便能看出這環節的重要性。因在此歷史敘事中空間距離與血源距離有密切關係，由「弟兄祖先」記憶凝聚的人群，是由最親密的家庭，直到大區域中包含許多溝、許多地域的人群，因此「弟兄」隱喻也存在於我群與這些或近、或遠的人群之關係中。也就是說，每一人群都可能是共享資源的「弟兄」，也是親兄弟各有各的分之「弟兄」，也是有潛在敵意與威脅的「弟兄」。就是這樣的情境下，我以「親近人群間的敵意」與「對遠方人群的敵意」相生相成，來解讀「毒藥貓傳說」與相關現象。

由「弟兄祖先歷史故事」，我們也可以了解，或反思，第五章中我所稱的「典範羌族史」；事實上這是在中國人的「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下，中國知識分子以三苗、炎帝等被打敗的祖先為隱喻，添加近代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等知識所建構的歷史。同時我也在第八章「羌族認同與英雄祖先歷史」中，說明近代「羌族認同」的形成，主要是藉著「英雄祖先」歷史心性所建構的歷史，而這些「英雄祖先」大多是漢人歷史記憶中的「英雄」。我也由本地端公經文中，分析一個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當地人之我族建構有關的「英雄征歷記」敘事，並認為「英雄征歷記」敘事可能是走向「英雄祖先歷史」的一個中間階段。

在文化篇，第九章所提及的「古羌人文化：事實、敘事與展演」，事實上是說明第六章「羌族史的再建構」歷史過程之文化過程。也就是說，經過這樣的文化過程，透過親近人群間的文化歧視、污化與模仿、攀附過程，許多的「羌人」變為「漢」，因此造成華夏邊緣的西向擴張。這一章也說明，在近代國族主義下，透過民族學的邊疆民族文化探索與描述，如何再造一個新的華夏邊緣，也就是少數民族。第十章，說明羌族在國族邊緣建構中成為一少數民族後，羌族知識分子如何再造本民族語言、文化；以及，如何透過文化展演而強調各種「身體」的凝聚，以及各種「身體」與「身體」之區分。

## 延續性思考

在本書中，我考慮到「歷史心性」與「文類」兩種敘事結構，如何影響文本生產及其間的權力關係（politics）。我也略提及，「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如何在華夏的西向擴張中，在許多地方皆取代「弟兄祖先歷史心性」，使得許多人直接、間接成為「黃帝子孫」。目前我正在作的（利用行政工作外很微薄的一點時間），一方面是檢討我自己在這本書中的知識體系，歷史記憶如何透過心性、文類、情節等的結構性安排，又在敘事中展現個人與現實情境差異，如此之歷史記憶又如何造成社會本相的延續與變遷。我希望能寫成一本小小的書。另外，以此為基礎，我也希望由「英雄祖先歷史心性」、「文類」等，透過其中的血緣、空間與權力等敘事，來寫一個有關中國民族與近代國族形成過程的書。這兩個寫作構想，已出現在我的一篇近作〈瓦寺土司的祖源〉之中（在歷史人類學學刊審查中）。

## 人類學評論

何翠萍（民族所助研究員）

首先感謝「歷史記憶與文化建構研究群」主持人，顧坤惠、郭佩宜、葉春榮組織一個結構這麼好的會。當然我更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與沈松橋先生及作者共同討論這本書。這本書不是我第一次讀，事實上，大多數王先生的書及著作我都讀過，也做過多次評論。本書同時也是我上「中國少數民族」課上的指定讀物。可是即使那麼熟悉他的著作，此次對話卻沒有因此而變得簡單。

首先我必須要說，這本書就像《華夏邊緣》一樣，實在是一本非常浩大的書。作者期望這本書不但是一本羌的民族誌、華夏邊緣的歷史民族誌，而且還是漢、藏、彝族邊緣的歷史民族誌。同時，作者希望透過羌族及其歷史，來說明漢、藏以及部份西南民族族群邊緣的形成、變遷以及其性質，說明人類一般性的族群認同與區分理論，解釋當代漢羌藏族之間的族群關係，或者是更大範圍的中國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問題，最後提出一個新的歷史人類學的詮釋。這個新的歷史人類學的詮釋，就是王先生所說的，要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是非常成功的。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成功地挑戰了一般所熟悉和信賴的「文化」

和「歷史」。

可以對這本書說的好話實在很多。但因為今天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我還是希望能盡到對話人的職責。對話的主軸將以作者方法論及理論立場與取向為出發點。歷史的部份就留給沈松橋先生了。

作者有四個方法論及理論立場與取向：作者認為所有文獻、口述材料或當代所見有關於羌族的文化、民族與歷史現象等，都是一種「文本」或「再現／表徵」（頁 xxv）。全書中，有引號的「文化」和「歷史」，是有別於沒有引號的文化與歷史的。其次，這些文本是「由歷史上一連串的事實所造成的歷史事實」（頁 xxv），它們「都是一些歷史與社會本相（reality）的表徵」（頁 299）。三，作者希望透過這些「文本／再現／表徵」，來了解背後的歷史民族誌「情境」或「社會本相」及其變遷，及「其所映照的（reflexive）我們所熟悉、信賴的『文化』與『歷史』之本質」（頁 xxv-xxvi, xxvii）。四，作者認為在本書中，此種歷史與社會本相，也就是這本歷史民族誌的情境，「便是在歷史上延續與變遷的華夏邊緣，及其所孕含的各層次族群、階級、性別與地域人群關係」（頁 xxvi, 299）。也就是說他不但要探討什麼是文化和歷史的本質，同時還要解決歷史本相與社會本相的問題。

王先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自我定位前提，是在讀本書時必須理解的。他明白表示他是一個「研究族群現象的歷史學者」。所以任何與歷史族群現象無關的東西，都不在本書討論的範圍。所以我在此可以討論的空間，就在於他用田野調查的什麼資料做文本？他如何利用文本來探索歷史跟文化的本質，以及歷史本相和社會本相？

首先我需要王先生澄清的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為沒有引號的文化、歷史的本質也都是建構的？如果是，這本書對於文化建構的討論似乎不足。例如我覺得「毒藥貓」故事裡，牽涉到的文化層次非常多，絕對不是單純地用從外而來的女人，做一個污穢的表徵所能解釋的。而事實上，王先生對女人的污穢，如何可以連結到「一截罵一截」的族群體系下，人群對外界的恐懼上，討論得並不夠，分析的層次似乎也還不夠仔細。我認為類似此類文化面向討論之不足，可能會影響我們對於社會本相的了解，以及王先生所要完成的羌的民族誌的書寫。希望作者能對此點有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王先生田野提問的問題。王先生在田野的提問是「這裡的

人是從哪裡來的？」這是一個起源的提問。如果歷史是對過去的一種呈現，為什麼它必然以如此的起源提問來作呈現？為什麼歷史一定就是在談起源？王先生似乎沒有討論。

當然王先生的提問，有他在建立弟兄祖先與英雄祖先歷史論點的意義，但從這樣的提問出發，與王先生收集資料的範圍看來，我擔心是否會掉入目的論的陷阱？王先生在 180 頁有一個非常好的圖。這個圖從空間上顯示漢代以來，羌人概念的萎縮與重現的範圍。在同樣的一個空間地理中，羌人的範圍從原來一個很大的圈圈，逐漸縮小，到二十世紀初變成一個點，到 1950 年代稍微擴大了一點點，成為現在羌族的範圍。王先生要做的是羌族的歷史民族誌，所以就以這個最後稍微擴大的現在羌族為田野訪問的範圍。在這種狀況之下，他用的語言只能是漢話，而不能是鄉談話。因為鄉談話的使用範圍太小。問題是在此當代羌族漢話的空間範圍來說，當人們要回答「這裡的人是從哪裡來的？」時，首先他們總會提及與他們相關的人之間的關係。兄弟關係是他們共同的回答，也是王先生論點建立的出發點。

可是真正涵蓋在各自所談的兄弟關係下的內容，卻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弟兄事實上是地緣關係的弟兄，有的是血緣關係的弟兄，有的其實只是儀式關係的弟兄，而有的儀式關係中還有一層以共同分享犧牲為比喻的弟兄關係：各自分到牛尾巴、牛頭殼和牛身子等。從人類學討論社會結群建構的角度，這麼多不同內涵的「兄弟」關係要放在同一層次談，若沒有相當過程的陳述，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從人類學親屬稱謂的講法來講，兄弟在某些社會可以只是指父方的兄弟，在某些社會可以只是指母方的兄弟，在某些社會可以指父方和母方所有的兄弟，全部都叫兄弟；在某些社會可以是指在同一家生長長大的人、祖上有同一家關係的人全部都叫兄弟；在某些社會一整個長屋的人通通都叫兄弟，只要他是同一個世代的。沒有討論這些不同的兄弟內涵如何集結人群的意義，讓我覺得不安。

當然我必須承認我的不安是來自我學科訓練的「包袱」。我們的訓練讓我們讀各地的民族誌，也造成我們常需要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為什麼某一群人、某個文化會以如此的方式做認同與區分？為什麼甚至生活在同一個生態環境裡的人群，從同樣面對的人的問題出發，卻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表現？這些不同的認同與區分的方式，如何卻又成為相同或更大的歧異？而從本書中，我們也清楚地

看見，王先生所承擔自歷史學訓練的責任。就羌人地帶而言，他首要回答的問題是在一個地區、這麼長的時間範圍裡，認同與區分的改變是什麼？如何做解釋？我同意王先生的問題也是我需要了解且應該承擔的問題，王先生承擔了。同時我也不認為王先生必需要承擔人類學的「包袱」或責任，回答我想要了解的問題。但是，假使我們都要面對人作為一個 agent 的問題的話，我們需要考慮兩方面要如何一起合作，才可以讓我們對於 agency 的問題能提出更精采的回答。

王先生的計劃不斷進行，所以將來受他著作影響的人自然也越來越多。怎樣才能讓我們共同合作起來，能夠真正達到對羌人地帶知識上的提升是我很關心的題目。所以我最後的問題是，您未來的研究計畫，是要延續這種華夏邊緣的研究，而做不同華夏邊緣的研究？還是有打算比較仔細地延續既有羌人地帶的研究，分區域做不同羌人邊緣更細緻的研究？謝謝。

## 歷史學評論

沈松僑（近史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明珂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有機會參與明珂兄大作《羌在漢藏之間》的討論，個人感到十分榮幸。我們知道王先生十幾年來都是從事中國族群歷史研究，我個人做的是有關近代中國民族建構的問題，所以跟王先生是滿熟悉的朋友，對於王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功力跟成就，一向非常佩服。王先生的前一本書《華夏邊緣》，其實提供我自己在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許多重要的、一些在方法上面、在見識上面的學習方正。王先生在那本書出版後，陸續發表多篇精采的論文，這些論文大抵上收進了去年發表的、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這本新書《羌在漢藏之間》。

所以當主辦單位要我來擔任評論的時候，我想既然讀過了，當然可以稍微講一點話。但是等到我再仔細把這本大著好好地從頭到尾再看了幾遍之後，我發現上當了。雖然那幾篇論文各有不同的題旨，但是只有從這本《羌在漢藏之間》，我們才能夠真正看出來王先生在這本書所展演出來深厚的學術功力，還有許許多多非常具有創意的洞見跟論點，其實都是為了構成一個非常龐大的理論架構，可以看出在學術上非常大的企圖。我作為一個只注意細節、具體事物的歷史學者，說

實在話，很難在這個層次上面跟王先生進行對話，所以我只能夠以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工作者、以讀者的身分，把我看過這本書以後一些膚淺的感想跟各位報告一下，也順便跟王先生請教。

就像王先生在前言裡所提出來的，這本書表面上是一部從華夏邊緣這樣的理論視角，來探討所謂羌族這樣的中國少數民族的形成、變遷跟它性質的歷史民族誌。實際上，剛剛何小姐也講過，這本書所關心的主題是試圖藉由羌族形成過程的分析，來對於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民族／中華民族這個群體跟概念、起源跟形成問題，提出一套嶄新的歷史人類學詮釋，我們甚至可以看出王先生在這一套精采的學術操演裡，他更試圖透過對人類資源的分享和競爭這樣的關係，以及這套關係在社會文化歷史記憶上的再現，來建構出一套詮釋人類族群認同和區分這套現象的一般性理論。

我想用王先生的話來說，這本書是一部結合歷史民族誌和現實關懷的學術書寫，我們可以看出，爲了達成這樣巨大的目標，王先生一方面發揮他作爲歷史學家的本色，對於相關的大量歷史文獻和檔案，幾乎我們想像得到的，都可以在這本書的書目中找到。同時我們也看到王先生盡力跨越學科藩籬，多次進入羌族地區田野考察，我想這大概不是一般歷史學者可以做到的。再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多方面吸取了社會學界相關的族群理論，來跟他比較熟悉的人類學理論比照互勘，斟酌損益，共同構成一套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框架。我相信，王先生的努力確實是對中文學界的歷史學者跟人類學者，在共同思考怎麼樣突破雙方的學科界線、怎麼樣彼此借鏡這樣的工作上，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我想今天工作坊的主題是所謂歷史人類學的課題，就這個課題而言，王先生在這本書裡，高度自覺地採取歷史學人類學化、民族誌歷史化，這樣一種雙重的研究進路。就像 Marshall Sahlins 所曾指出的，歷史是在不同的社會裡面，按照有意義的事物的規律，用不同的方式，在文化上面被安排的。同樣地，文化的規律其實也是在歷史裡面被安排的。因爲各種意義在付諸實際行動的時候，多多少少都要重新被詮釋、重新被評價。我想這段話，或許可以做爲歷史人類學非常簡短的詮釋。我想王先生也是在這樣一套理論意識之下，透過社會歷史記憶、文本、敘事、展演這些概念、範疇，作爲他主要的分析手段，對我們習以爲常的具有典範意義的，像民族、歷史、文化這些重要概念，來提出深刻的批判和解構。

在這過程裡，王先生所關心的不只是過去怎麼樣創造現在（說實在話，這是歷史學者比較關心的歷史民族誌問題），同時他也深入地探究到對於過去的建構是怎樣被用來詮釋現在，這樣一種歷史人類學問題意識。從這樣艱辛而巨大的努力，王先生所重新建構的華夏或是華夏邊緣的歷史民族誌，可以說已經有效超越或突破了以前在族群理論裡面經常看到的對立性範疇，比如像歷史實體論和近代建構論，或者是我們常見的關於 structure 和 agent，這些對立範疇之間糾纏不清的複雜關係。我個人對於王先生這本書裡面所提出來的重大學術貢獻、突破性的成就，實在只能說是表示欽佩，除了佩服之外，實在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不過當然也不能只說佩服、佩服就下台了事。作為一個評論人，當然還是必須想一些不太好聽的意見，以便讓大家有一個討論的起點。所以底下會按照我個人粗淺的想法提出幾點意見，跟王先生請教。當然我提出來的意見，各位可以看得清楚，一定跟何小姐不太一樣。我們問問題的方式，事實上就顯示了歷史學和人類學可能在學科上面有不同的提問方式、不同的問題意識。

首先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對這本書的標題，跟在這個標題之下所開展出來主要的書寫策略表示點意見。這本書的主標題是「羌在漢藏之間」，顧名思義，當然是企圖用漢跟藏這兩個相對強勢的民族文化體系，它們彼此之間的對抗與交鋒，來詮釋所謂羌人所居的邊緣性位置。不過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王先生是延續他上一本《華夏邊緣》這本大書，基本上還是用華夏邊緣這種理論模式，來解釋羌族和羌文化的邊緣性和模糊性，所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在這樣的過程裡所塑造出來的特殊認同跟區分系統。

在這樣的書寫之下，我們會有一種感覺，似乎王先生還是有一種相當強——當然我想這不是有意的——比較強的漢文化中心的書寫策略。在這種策略之下，其實作為羌被塑造出來的兩大勢力之間的另外一端，作為漢文化對應勢力的藏族跟藏文化，基本上在這本書裡面，不太看得出來。所以羌的那種一節罵一節、那種認同跟區分系統裡面，我們對漢所代表的文明進步這一端，可以比較明確定位，至於蠻子落後野蠻這樣作為隱喻的藏文化，所塑造出來的羌人的另外一個邊緣，我們或許不太容易在這本書裡，得到全面性跟整體性的說明。

其實，李亦園先生在替王先生所寫的序言裡面，也舉出百越的例子來說明百越跟羌不太一樣。為什麼不一樣？以前就提出這樣一個質疑，是不是因為有藏人

爲一個對稱性的另外一個主體，會造成這樣一個不同族群現象。我想，對於藏文化所建構的所謂羌人的邊緣性，是不是也應該在王先生考慮的對象之內。當然，說實在話，這本書裡面王先生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其實在第 337 頁注釋十五、第 371-372 這幾個地方，多多少少都提到藏文化在這個過程裡面所發揮的作用。

當然他也對於他之所以沒有辦法把藏文化在這裡面所扮演的功能跟角色，提出比較詳細的闡釋，他也做出了一些辯白跟說明。我們也知道以一個人甚至一個團隊的精神跟力量，要做這麼龐大的工作是強人所難。不過雖然是強人所難，作爲讀者，還是可以強人所難。我想還是可以希望王先生在這方面有更多更精采的詮釋。

其次，就像剛才何小姐的評論談到，我們可以從王先生在這本書的書寫方式裡，他所提出的分析範疇跟工具看出來，王先生明顯地受到當今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我們看到他有非常強烈的文化轉向，或者語言學轉向這樣一種取徑，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本書裡面，他跟一般歷史性書寫其實很不一樣。他基本上是用文本、敘事、展演這些概念，來鋪陳、開展他整套論述。當然在這分面分析，我想讀過的人都知道，非常精采，我個人也非常佩服。不過，做爲歷史學者，除了文本語言這個層次之外，我想歷史學者會比較關心的是超文本、超語言，那樣一個社會實際運作的過程。

換句話說，相對於這些文化性的運作之外，我們會問，關於政治經濟學的過程，還有一些制度性的層面，對於整個羌族的族群建構跟它的變遷過程裡面，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如果我們從新制度史的角度來看，人爲的政治制度建構，其實對於整個人的意識跟行爲會有決定性的作用。就像 Rogers Brubaker 在他那本 *Nationalism Reframed* 裡面談到，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的時候，所有加盟的共和國是被定義、被制度性地建構爲民族共和國，所以等到 1990 年代初期，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瓦解的時候，在制度性建構出來的加盟共和國，很清楚地就發展出一套獨立的、自主的民族意識，然後變成一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所以，制度性的層面怎樣影響到族群的自我認同、怎樣影響到人群的社會行爲，我想這也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我以爲，或許明珂兄可以考慮，以單一羌人聚落自 1980 年代開革開放以來的民族誌調查，來作一點補充。

最後一點一直是我跟王先生之間的一點矛盾。剛才何小姐也提到，在歷史學

跟人類學之間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一些重要的文化、族群現象，他到底是一種延續性、或是斷裂性的現象？在這裡面，王先生是有意識地超越歷史實體論，那種強調延續性，以及近代建構論強調斷裂性，這兩種他認為是比較偏頗的理論取向。我們如果用民族主義分析的理論模式來看的話，我個人認為，或許王先生是比較傾向像 A. D. Smith 那種 ethno-historical 一種族群歷史的取向。基本上是強調近代的、民族的族群現象出現，是一種近代歷史出現的獨特現象，但他同時也從過去、從傳統之中承襲延續了許多獨特之處。不過，王先生，我想各位看得很清楚，他非常聰明，他並沒有誤蹈 A. D. Smith 的一個重大錯誤。我想 A. D. Smith 會認為延續的，是以往那些族群一些獨特、特定的文化或體質的特質。

但是王先生在這本書所強調的，延續下來、不變的，其實不是任何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一套中華民族或者是所謂華夏怎麼樣去建構他的族群的模式。所延續下來的，其實是一套在特定歷史情境裡面，怎麼樣建構人群認同跟區分的系統。我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王先生基本上認為歷史有它的延續面，這個延續面所強調的當然是一種結構性的、模式性的延續。不過，就我個人作為近代史研究的工作者來說，我想為了 justify 我們學科的正當性，我個人還是喜歡強調歷史的斷裂性，尤其作為民族這樣一種特定概念跟範疇的出現，基本上我認為這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這種概念整個影響到關於人群變遷的概念、關於自我身份的認同、關於整個文化社會基本認知範疇，從這樣的角度來說，其實民族這個人群出現的斷裂性，或許要超過王先生認為他只是一個華夏邊緣建構的一個新階段，這樣的歷史意義還要多得多。

最後的小問題，當代羌族的民族化過程中，羌族知識分子除了致力於選擇或建構一個榮耀的起源外，另一種弱勢族群所常見的反應與實踐——對本身文化傳統的批判與拒斥（這也是一對傳統的建構），是否也曾在當代羌族知識份子中出現？

我大概只能夠從這些方面，對王先生提出一些淺薄的意見，向各位請教，謝謝。

## 王明珂答問

謝謝舉行 workshop 的那一天，幾位朋友的提問；當時限於時間，限於言詞，我或許沒有完全回答問題，或沒有充分回答。無論如何，我非常感謝這些問題，它們的確能幫助我進一步思考。以下，我回顧那一天的問題與回應，並作一些補充。

首先，關於翠萍所問，我是否認為文化與歷史的本質都是建構的？如果我們將這兩個詞都加上框號，如「文化」與「歷史」，那麼我基本上認為它們都是建構的。但它們又無法脫離時時發生的、可被視為文化與歷史的各種表徵（人、物、事件）。因此我認為建構一詞無法表達它們（happening 與 remembering）間的錯綜關係。這也是為何，譬如，我注意「歷史心性」與「文類」在人們建構「歷史」、產生歷史，及生存於此「歷史」與歷史上的重要性。如在傳統中國，「英雄祖先歷史心性」與「地方志文類」如何導引地方人士建構「歷史」，並因此產生地方／中央、分支／主體關係之歷史，並讓一個州縣的人生存於此「歷史」與歷史之中。

其次，有關我對「毒藥貓傳說」的解釋不夠周延的問題。的確，這一部分的原始論文發表在史語所集刊時，我自己也對其中一些環節的解釋不很滿意。因此在寫這本書時，這部分我花了很多功夫來思索、增添一些論述。我將「毒藥貓傳說」與相關村寨民眾的言行當作一些表徵；我認為這些表徵背後的社會本相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家族與村寨人群認同。「毒藥貓」是「親近的外人」之代表，對她的恐懼與敵意，影射著人們對一層層外在「異己」的恐懼與敵意。我原先的邏輯，由本地「女人的污染性、魔性」、「女人由上游嫁來，因此可能有蠻子血緣」、「舅權與父權的衝突」、「無毒不成寨」等等本地概念衍生而來。在書中所增加的論述，除了更細的「溝中的人」社會情境介紹外，主要是：在此「族群」為由最小、最親近的血緣群體，延伸到最大範圍的「我族」，如此一層層邊界所造成的人群。這些不同層次的「族群」，經常都是以「弟兄祖先故事」記憶來凝聚；也就是說，家庭、家族、寨子的人、溝中的人、爾瑪等等，都是同一空間、血緣與資源邏輯下集結的大小人群。弟兄隱喻顯示，親近群體間常存在著敵意；事實上也是如此，

人們對「親近的外人」常有敵意。「毒藥貓現象」便是在如此情境下產生的「邊界混淆」；頁 98-99 有一則口述資料，可以讀出口述者如何泛用「族」的概念，由此也可佐證「邊界混淆」是如何產生的。也就是，「異己」是由最近身的他者延伸到遠方的「蠻子」，於是在孤立與充滿生存危機的環境下，跟一些親近人群的矛盾讓他們更仇恨、恐懼遠方的敵人或「異己」；對遠方「異己」的仇恨與恐懼，也讓他們恐懼並懷疑身邊的「異己」。就是在這樣的族群認同體系下，村寨裏某一個女人常被當成代罪羔羊，被視為「毒藥貓」。

我分析這些口述資料，結合我對當地社會的認知，而認為這是「邊界混淆」現象。為什麼女人成為代罪羔羊？因為女人一般都是從上游嫁過來，他們就更有理由懷疑女人帶有蠻子血緣。「蠻娘漢老子」這句在本地經常用來咒罵人的話，也顯示他們對「女人」所帶來「蠻子」血緣的憂慮。其實罵毒藥貓，也是發洩對於遠方蠻子的恐懼；這個遠方的蠻子或「他者」有時候不是很遠，就是隔壁寨子、鄰溝的人群。選擇一個「毒藥貓」，代罪羔羊，是為避免敵視所有親近的女人。如果我還是無法舉出足夠的田野證據來說服人類學者，可能是因為，我在構思這些論述時所參考的並不都是人類學的討論，而更多是比較文化或文化研究中如 Rene Girard 的討論（嗯，好像找到一個代罪羔羊）；因而我對此解釋或論述的可信度，不只是在於此「田野」，而在於它在類似社會文化情境中的 applicability；以此而言，我認為「毒藥貓現象」是很普遍的。但的確，我承認，更好的作法可能是在有「苗女放蠱」或「彝族鬼婆」等傳說的地方，作相關文本與情境分析的比較研究。

第三，為何問「起源」，而非其它的「歷史」？在分析族群認同上，我主要問這一群人的「起源」，是因為此種認同建立在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之上。在羌族來說，就是「一個根根的人」；自然我會問這個記憶中的「根源」。但事實上，我也採集其它的「歷史」（或我們將之當作神話傳說），分析其中的族群認同含義，如他們對周倉、樊梨花、大禹等等「過去」的敘事。

松僑兄問，書名《羌在漢藏之間》，但為何內容卻偏向由漢這一方的文獻來分析此邊緣？的確，我承認在此是有不均衡；這是由於我沒有能力從古藏文書與文化中作同樣的分析——分析不同時期的吐蕃或衛藏核心地區知識分子，如何想像、建構東方「異族」，這「異族」概念的漂移，及其異類本質的變化。我曾鼓動

幾位藏學家作這種研究，但精通古藏文經典的學者太少，他們又難得有動機、有機會進入田野作調查。因此可以說，這書名只是表示我在社會篇呈現的「羌在漢藏之間」的語言、體質、宗教與一般文化現象，過去本地人在主觀認同上的「爾瑪在漢人與蠻子間」之現象，以及歷史篇中所說明的，本地「爾瑪、漢人與蠻子」後來部分成為漢族、部分成為羌族，部分又成為藏族之現象。在歷史篇裡，我所提及的只是吐蕃興起及其東進所造成的，在漢人看來的羌人地帶人群之「番化」。因此可以說，相對於我對「華夏邊緣西移」過程方面所作的歷史人類學分析，在藏方面，我作的主要只是歷史學的分析。

但我仍在書中提及，在古藏文書中，當時知識分子曾以一「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壞弟弟被逐於東方」，來說明青藏高原東緣山間部落人群的「祖源」；我也以此比較在《後漢書西羌傳》中，中國人以一「失敗英雄被驅逐的西方」，來說明這些青藏高原東緣部落人群的「祖源」。以及，當代「弟兄祖先故事」所含的血緣關係隱喻，在緊鄰羌族的藏區，敘事中的弟兄「菩薩化」而成為一種信眾關係隱喻。只此而已。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知道，「弟兄祖先故事」可能是整個康區、藏區最古老的、底層的歷史心性，在吐蕃時期曾一度產生「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在康區有強大土司的地區也曾產生「英雄祖先歷史心性」，我們可以分析格薩爾王傳說的空間分布。但不知何時起，經由如何的過程，所有「歷史」中的祖先都開始「菩薩化」；而菩薩化的趨勢，也就是接受藏傳佛教的傾向，或與本地「山神」信仰有關。這些，我只有大致的想法，但我此時沒有能力作進一步的研究，自然也無法寫在這本書中。

有關松僑（及後來林開世）均提及的，「政治、經濟、制度」等對羌族認同建構或羌族形成的影響。我在這方面是有提及，如在政治方面，中國國族建構下的「國族邊緣探索與建構」，在經濟、制度方面，如少數民族優惠政策與少數民族自治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等等。但在這方面我沒有多談，也沒有深入討論這些問題；這些已被歷史學者談得很多了。我想，開世似乎提及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們如何兼顧歷史學家一向關注的政治、經濟與制度層面之歷史，以及部分歷史人類學家所關注的歷史結構、記憶結構或歷史性（historicity）等等。我認為，這兩者並沒有矛盾，而有相輔之效。譬如，我所提及的「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在它一產生，便注定了中國一些政治、經濟與制度的走向。更具體的說，它產生一些「文

類」，如「正史」，此文類不斷產生新的正史文本，正史文類的結構性具體規劃了帝制中國內外的政治、經濟與制度。由正史文類再衍生「方志」與「族譜」文類；如「方志」文類下的文本，也使得在政治、經濟與制度上一「地方」得其特質。便如，歷史學家會注意秦漢以來中國人如何開發巴蜀，相關政治行動、經濟動機與設郡、設太學等制度。但我所見的是，華夏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下的西向拓殖，以及巴蜀人接受此歷史心性也接受黃帝為本地古帝王的英雄祖先，因此成為新的華夏邊緣之過程；蜀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不但模仿《史記》之正史文類，也開創了一個新文類，「方志」。透過《華陽國志》書寫，蜀人常璩將本地及本地之人化為「中國」的一部分。我不願去描述秦漢以來發生在巴蜀的那些政治、經濟與制度細節；我認為那都是表相（如果歷史學家的史實重構正確的話），但並不表示它們不重要。這些「表相」（representations），也強化一些當時的「本相」（reality）；如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下屬、邊緣性。

又譬如，我分析章太炎如何藉由「羌」來建構他心目中「中夏之族」歷史，胡鑑民等如何在羌民文化探索中建構一落伍的少數民族文化，而本地人又如何透過歷史與文化建立自身的羌族認同，以此說明近代「羌族」的形成。我也分析《後漢書西羌傳》與「當代典範羌族史」之書寫，以說明中國人如何塑造與重塑其空間、血緣與資源的西方邊緣。在這其中，我所關心的是與書寫、文類、心性有關的「政治」（politics），其在資源分享、競爭上的「經濟」意義，以及結構性的文類、心性與各種「制度」間的關係。至於漢代的邊防制度，當前的少數民族制度，相關的政治事件等等，我認為皆是歷史表相。

關於歷史的延續與斷裂問題，在此我與松僑並沒有太大的歧見。松僑所強調的是近代建構所造成的與過去間的「斷裂」；一方面是客觀存在的建構，如中華民族，與過去之間的斷裂，一方面是對「歷史」的主觀「斷裂」想法，一切都是「新」的開始。這我都是同意的。我所強調的是，知其延續性，我們才知道近代的變與不變。如由「羌人」到「羌族」，在那地理空間的人群都是「華夏邊緣」並無改變；以此分析其歷史敘事，我們才知道這「邊緣」在近代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又如，由「蠻夷」到「少數民族」那些人群都是華夏眼中的「異族」，分析以粗壯醜陋男性為表徵的蠻夷，到以性感妙曼之少女為表徵的少數民族，我們才知道華夏或中國人如何在近代重造此「邊緣」。又譬如，「炎黃子孫」如何由一個歷史心性下的

敘事開始，透過正史、族譜等文類，由上而下、由核心而邊緣，造成當今的「炎黃子孫」；注意此延續性，反而有助於讓我們了解民族學、體質學、語言學等等如何幫助國族想像，並造成當今「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間明顯的斷裂。

## 與會者發問

馬騰嶽：

王老師，首先非常謝謝你，你的兩本書我都是忠實讀者，這本書還讀到都脫頁了。首先對您的著作非常肯定，好的話就不用說了，直接說有意見的部分。首先我覺得您兩本書不管從理論或書寫模式，有很大的轉變。前面《華夏邊緣》的時代可能比較著重歷史的資料，甚至引用大量的考古資料去對應您的看法。到了第二本書《羌在漢藏之間》，開始有了很多的田野資料、訪談報導人的訪問，我想對您個人來講，確實是很大的轉變。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問題，這兩本書裡面我覺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個矛盾。其實您在第一本書裡，一再強調所謂「羌」的概念是一個外來的概念，是一個漢人加諸於他們的概念，而當地人有非常多語言上的差異，甚至對於我群的認同都不同，《華夏邊緣》的 332 頁開始，您有很仔細的描述。但是到了《羌在漢藏之間》，我發現您的看法，譬如在 294 頁，您也認為所謂羌族概念的形成，從 1980 年代以後，羌族的知識份子開始做羌族本質論的建構。

我的疑問是，羌族本身內在有這麼大差異性的人群，如果我從您書中了解關於您所講的歷史心性的本質性探討，其實它是非常競爭的，像您說的「一截罵一截」這樣，如果像林開世老師講的文化邏輯，它是非常競爭的。這麼大的 20 萬的人群，如何面對一個羌族、在一個羌族的知識架構之下去分享資源？因為您這邊也講得很清楚，解放之後，因為中國給予少數民族很多的政治資源。我的一個疑問是，如果您長期以人類學的方法在當地作田野，是不是也能夠比較深入的理解，在一個羌族的建構之外，也有不同羌族的競爭？但是在這個部分，我們在這本書上看不到，我們只看到您對一個羌族建構的描述，但是看不到很多羌族競爭的描述。謝謝。

羅烈師：

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從沈老師那裡延續出來，剛剛王老師也回答何老師問題的時候提到的，那就是所謂延續性跟斷裂性的問題。剛剛沈老師的意思是，不太確定延續性的本質是什麼、是一個模式的延續性。王老師您回答何老師的時候，提到是建構還是實踐的情況下，您用了 social context，您好幾次用到歷史心性。我的問題是，那個延續性的東西是 social context，還是您所謂的歷史心性？那到底是哪一個，比較精確的是，它是有關係的、還是怎麼樣？謝謝。

林開世：

其實我不是問你，我只是很好奇；因為沈松橋先生問的政治經濟的部分，我非常好奇，因為我自己非常非常困擾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我想知道王先生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對我來說，作 narrative、作 textual，要跟 political economy 的 approach 要結合，至少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不過我想知道王先生您怎麼作？

馬騰嶽：

從王老師的書裡面，我始終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我不太能理解您寫這本書的出發點。您稱自己是一個建構論者還是一個本質論者，您在書寫的過程中、做這個探討的時候？

張隆志：

簡單問三個問題。第一個，沈松橋先生在評論裡，覺得您基本上已經克服了很多二元對立的觀念。是不是從長期的角度來談族群史的建構過程、談一點建構、這樣兩邊都談一點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就克服了所謂緊張跟對立的關係？也就是說，簡單來講，您的知識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就您站在現代的立場，覺得有一個實在的 reality 的部分，還是基本上您是採用比較後現代的立場，不承認有 reality 的東西，基本上您談 representation。也就是您談 reality 跟 representation 的關係，兩邊都有談到，而且談得非常細，在這個精緻度上已經超越了前人，但是是不是真的解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您在方法論上雖然用了許多的文本分析，但您從來沒有用 discourse，爲什麼？爲什麼您談文本分析，不談論述分析，是不是顯示您在方法論上某些特色。您不把羌族史建構看作是一個族群的論述，或用 Foucaultian 的角度來解構它或討論它。您只是談 textual、談 story telling，爲什麼？這個是不是反映您在方法論上的一些特色。

最後，您在學術政治上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說，這本書到底爲誰寫作、爲何寫作？您的主要對象是學院裡面做羌族史跟民族史的人？還是這些生活在中國邊疆、漢藏之間爲數二十萬的羌族人？還是有權利主宰這些人命運的 policy maker？當您的作品被至少三種不同的讀者讀的時候，事實上會產生不同的效應。也就是您的作品作爲羌族史建構的、或解構的、或再建構的過程的一個很重要的 element 的時候，您期待它發生或不發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想這是我很好奇的問題。

### 王明珂答問

有關隆志所提及，我並未解決歷史建構與歷史事實二元對立的問題。對於這問題，在這本書中我已呈現了一些想法。簡單的說，在歷史篇中我所建立的歷史事實是，「羌」（作爲華夏邊緣）所反映的華夏西部空間、血緣與資源邊緣形成與變遷的歷史。這個歷史事實及其過程，是許多歷史心性、文類與相關歷史記憶的建構與變遷所造成的。在寫作末期我已在嘗試作一些更有系統的理論性思考，但我決定將這部分放在另一本書中。在我去年十一月兼行政職之前已完成初稿五章，但不幸就此耽擱。我的想法，在前面對翠萍、松僑、開世的回答中已表現了部分。在此我只補充一點點；也就是，我希望從形成歷史記憶也因此導引個人與集體行爲的「歷史心性」、「文類」、「文本」之敘事結構與情節，來探討社會本相與歷史本相的問題。至於許多歷史學者所強調的「歷史事實」，無論那是史實或是學者集體建構的記憶，我們都可將之視爲不同層面的表徵或表相，作爲一種分析對象的「文本」。

有關隆志所提及，我的「學術政治立場」或本書設定的讀者爲誰。這是一本有關歷史、社會與文化的學術著作，一本歷史與人類學或歷史人類學著作。其中

涉及許多的主題，如歷史心性、歷史敘事（記憶），與社會情境及其歷史變遷的關係；如親近人群間透過「文化」與「歷史」，所展現的敵意、污化、誇耀與模仿等社會互動，及因此造成的「漢化」過程；如透過「羌」所表現的華夏西方邊緣歷史變遷，及近代國族建構中少數民族識別的歷史意義等等。凡是對這些主題有興趣的，都是本書之作所期待的讀者；不限於「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者」或「中國研究者」，也不限於歷史與人類學學術群體之讀者。另一方面，我的確對讀者有些期望，那便是期望由解析我們所相信的歷史與一般性「歷史」概念，與相關的各種社會認同、區分及其文化表徵；以此映照的理解與新知，來反思我們的「知識」與產生這些「知識」的學術研究，及反思「知識」所強化的各種社會認同、區分及社會不平等。

羅先生所問，在歷史中延續的是歷史心性還是社會情境。關於這問題，我認為兩者都在歷史中延續及變遷。這是由於，歷史心性只導引人們建構、回憶與認識自身歷史存在（historical being）的方向，如此產生結構相似的「歷史」，使得某種社會情境得以延續；如「弟兄祖先歷史心性」下的「歷史」，讓溝中各村寨對等競爭的社會情境得以延續。溝中之「政治、經濟與制度」社會情境之延續，也使得生存其間的村寨居民此種歷史心性不易改變。但變遷的確會一點點的發生，那便是與外界接觸所產生一切新的 happenings，改變人們敘述、回憶「過去」的敘事細節（narratives）；或許還在同一歷史心性下，但個人經驗、新事物的發生，都影響敘事細節而終於改變了它基本的「情節」（plot），與原有的社會情境。或相反的，社會情境由於外來影響而轉變，因此也改變人們的歷史記憶敘事，以及改變歷史心性。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由北川的「弟兄祖先故事」中我們可以查覺，歷史心性如何在口述敘事中發生轉變，以及相對應的社會情境轉變。

林淑蓉老師：

時間已接近尾聲，我們謝謝各位與會者的熱烈參與，特別謝謝王明珂老師及兩位評論人的發言。

（編輯部按：本文實際出版日期為 2005 年 2 月）

## 附錄：議程

聯合主辦：清大人類學研究所，中研院民族所（原名：「歷史、記憶與文化建構」研究群，於七月更正為「歷史人類學」研究群）

時 間：2004 年 2 月 25 日（週三）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 議 程

| 時 間         | 議 程                                                  | 評論人／引言人                                                   | 主持人        |
|-------------|------------------------------------------------------|-----------------------------------------------------------|------------|
| 9:15        | 開幕                                                   |                                                           | 陳祥水<br>葉春榮 |
| 9:20-10:50  | 「羌在漢藏之間」新書發表與討論<br>(作者：王明珂，聯經，2003)                  | 人類學：何翠萍<br>歷史學：沈松橋<br>回 應：王明珂                             | 林淑蓉        |
| 11:00-12:30 | 評論「歷史人類學學刊」（中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編，2003 年發刊） | 介 紹：楊聰榮<br>人類學：林開世<br>歷史學：王明珂                             | 魏捷茲        |
| 12:30-1:30  | 午休                                                   |                                                           |            |
| 1:30-3:15   | 評論「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 59 期，2003 年）      | 人類學：葉春榮、<br>顧坤惠、<br>郭佩宜<br>歷史學：張隆志                        | 蔣 斌        |
| 3:30-5:00   | 綜合討論：歷史人類學回顧與展望的區域觀點                                 | 引言人——<br>台 灣：葉春榮、<br>顧坤惠<br>東南亞：楊聰榮<br>大洋洲：郭佩宜<br>中 國：王明珂 | 潘英海        |

編按：另請參閱何翠萍女士對本書的正式書評，刊於《漢學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期，2004 年 6 月，頁 479-495。